CHAPTER ONE

LANGUAGE PLANNING AND POLICY: THE DISCURSIVE LANDSCAPING OF MODERNITY

ASHRAF ABDELHAY,SINFREE B.MAKONI
AND CRISTINE G. SEVERO

1. 语言政策和规划：术语与概念

语言政策的概念复杂、解释多样且在社会上受到争议。通常来说，任何有组织的努力去影响现有的语言选择、结构和习得模式都是语言规划的一种形式（Ricento 2006；Tollefson 2008）。尽管语言规划实践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但在教育领域中它主要与选择教学媒介的决策有关，这一点尤为明显。这种角色可以得到认同，因为教育通常被视为政治和社会一体化进程的基石。这个过程的结果是给定机构（如学校）的明确或隐含的语言政策：一套旨在引导语言行为的规范或指南（Tollefson 2008）。Haugen（1959）因使用这个术语来涵盖与挪威语标准化相关的地位和语料规划而受到赞誉。

语言政策是多样的，根据其对象、干预层次、目的、参与者和涉及的机构、潜在的语言意识形态、地方背景、权力关系和历史背景等而异。语言政策和规划也与社会政治背景相关：例如，北美、欧洲、非洲、亚洲、拉美和俄罗斯/苏联传统并不具有相同的理论-方法论优先事项和方法。尽管存在这样的异质性，语言政策作为一个制度化领域的诞生与社会语言学的出现是并行的。这一出现的一个制度性标志是 1964 年威廉·布莱特在加州大学组织的一次研讨会，汇集了如埃纳尔·豪根、威廉·拉博夫、约翰·甘珀兹、戴尔·海姆斯和查尔斯 •弗格森等学者。我们认为，语言政策作为一门学科的出现，充当了一种意识形态框架，强加了“一系列对象领域，一套方法，一组被认为是真实的命题，一套规则和定义、技巧和工具的游戏”(福柯 1981:59)。

在西方，作为一门学科领域的语言政策配置的初始阶段旨在系统化和合理化一个适用于描述语言之间关系及其在国家范围内功能的模型，我们可以称之为“功能化政治”。这一时期反映在 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的一系列影响领域的出版物中，这些出版物将语言规划与现代化和国家建设的过程联系起来。学者关注国家问题的一个例子是 1968 年由费什曼、弗格森和达斯·古普塔出版的《发展中国家的语言问题》。Wimmer 和 Schiller（2002）提出的“方法论民族主义”原则将语言规划的实践导向了特定的语言意识形态。

语言意识形态是指关于语言结构和功能的常识性概念，这些概念规范地将其用户置于社会系统中，并通过制度和日常实践来实现（Tollefson 2008; Rubdy 2008; Haviland 2003）。语言意识形态体现了关于语言实践的指导功能、价值观、规范、期望、偏好、预测和角色等方面的观念（Blommaert 2006）。进一步来说，语言意识形态表达了更广泛的社会政治意识形态。

任何将某种语言变体制度化为政治和教育活动的主要语言的决策，都会导致没有被选定的语言和方言被边缘化和贬值，从而对说这些语言的群体和个人产生负面影响，即分层效应。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理解“地位规划决策符合精英权力的意识形态，或者是回应精英权力支持的意识形态与其他组成群体之间的冲突意识形态”(Cobarrubias 1983:62)。换句话说，语言规划领域的形成阶段受到“反映论者”（Silverstein 1985）的语言观影响，认为语言是代表独立存在事物的一组词汇。

然而，随后的批判理论发展表明，所有关于语言的政策话语在某种意义上都是表现力的

（这些政策论述不仅是描述现实的，而且通过改变社会对语言的认识和看法来创造现实），它们是社会表征的创造性行为，可以塑造和改变人们对语言、方言和社会关系的看法，因此与权力关系和不平等问题有关（Bourdieu 1991），因为它们可能通过赋予或剥夺某些语言的地位来改变社会结构。在适当的制度条件下，当官方政策将“方言”命名为“语言”时，将产生一种新的社会建构;这意味着现实被重新塑造,新的象征性表征被赋予现有的语言现象。

语言政策和规划中的对象和方法的初始领域的例子包括标准化、语言的分层分类(方言、标准语、古典语、克里奥尔语和皮钦语）以及语言功能的分类（教学语言、官方语言、国际语言、词汇现代化、国家化和术语统一等）（Lo Bianco 2004；Calvet 2007；Manley 2008；关于目标的详细回顾，请参见 Hornberger 2006）。

标准化在广义上涉及到选择、编码和实施或强制执行一种规范(豪根 1983；米尔罗伊和米尔罗伊 1999)。规范化和制度化的话语机制对所选择的规范进行规定，形成标准与非标准之间的二元对立,这些在社会中植根的价值观引导着个人的语言选择(布洛默特 1999)。因此,这些机制是实现共识、权力和不平等的策略，因为它们建立了系统性认可的语言等级制度。换句话说，标准化通过限制管理语言多样性的功能分布，这些限制导致了不平等的社会语言能力，影响到获得社会机会的途径(布洛默特 1999)。这是一个深刻的政治过程，因为它通过规范化和自然化的机制（包括教育组织机构）创造了差异和霸权。

语言规划和政策作为理论和实践都与民族国家建设和主体性建构密切相关。正如民族主义研究领域的许多学者所指出的(如安德森 1991),标准化作为一种语言系统化或制度化的过程，在构建"民族国家"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因此，语言规划始终是一个政治事业。

语言政策的框架（即制定、实施和评估关于语言使用和管理的政策和程序的结构）有助于创造一种抽象、脱离现实和规范化的语言概念，这些概念在教科书和教师指南中得以传播和复制。这种语言观念被称为“标准语言意识形态”（Lippi-Green 1997），(该观念强调对某种语言或方言的标准化和规范化，可能导致某些语言和方言的边缘化。）

此外，语言政策和规划（LPP）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刚刚起步之初，“符合当时盛行的科学乐观主义的智识氛围，这意味着当时的学术界普遍认为，科学和技术可以解决所有问题，而对科学的怀疑和批判相对较少。只有少数 LPP 先驱对对技术手段是否能完全解决问题表示怀疑，当时很多研究人员认为，可以通过技术方法消除语言政策和规划中的主观性和利益冲突。”（Lo Bianco 2004:740）。在制定语言政策时，研究者过多地关注技术性问题（如语法、发音等），而忽略了政治问题（如权力关系、不平等等），并导致了一种实证主义的做法（实证主义是一种关注客观事实和证据的哲学观点，认为我们可以通过观察和研究现实世界来获得关于它的知识）。这种实证主义做法虽然在学术界和社会中受到了一定程度的质疑和批评，但仍然影响着当代的语言政策（Rajagopalan 2005），在很大程度上塑造着现代语言政策的制定。

"批判性语言人类学视角"是一种研究语言规划的方法，受到批判性社会理论（关注社会结构、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批判的理论观点）的启示，该视角强调对传统方法的批判和对社会语境的深入理解。在这个视角中，'社会语境'的概念比在传统方法中更加复杂，它是一个不断变化、多元化的概念，其中包括文化规范、知识、条件和实践等多个方面，它由多层次的物质和象征关系构成，这些关系影响并组织着语言的使用。

语境不总是严格限制或高度有序的（像医生和病人互动那样惯常的话语秩序），也不总是根据固定的角色和地位来划分的（如 Silverstein 的预设指示性），而是在人们的互动过程中不断发展和变化的。这对于语言规划的启示在于，研究者不仅要关注与现实世界中的客观语境有关的方面，还要关注人们对这些语境的主观看法。

主流观点认为语言与其社会背景相互独立，没有紧密联系。这种观点有助于推广标准语言，因为它忽略了语言与特定文化和社会环境之间的联系。相比之下，在批判视角中，“语

言”被视为“文化”，认为语言与其文化和社会背景密切相关。在这种观点下，语言是由特定的社会环境赋予意义和价值的，因此它具有地域性、变化性和多样性。正因为如此，语言政策是一种元语用论述，因为它将语言问题与社会政治问题联系在一起。最重要的是，传统范式中的“主权主体”问题（具有独立决策权和控制权的个体或群体）正在向“谁在权力关系中有话语权和行动能力，即谁能在社会中表达和实现自己的意愿”转变。因此，我们需要研究话语环境（包括历史背景和解释方法）是如何影响对语言产品的评价，进而影响社会地位和权力关系的。

与语言政策相一致，语言规划既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过程（统一性），也不是在所有情况下都采用相同方法的过程（同质性）。例如，Einar Haugen（1966）在《语言冲突与语言规划：现代挪威语的案例》中，系统化了四个层次的语言规划：规范选择，编码/标准化，实施/接受和语言的拓展/现代化。后来，这些层次扩展到包括本体规划（编码、图形化、语法、词汇系统化、文学手册），地位规划（根据法律和法令的语言指定和用途），习得规划（语言教学和学习政策），使用规划（语言传播和使用的政治）以及声望规划（对语言用途的评估）。前两个层次的语言规划是由 Kloss（1967）提出的，第三个是由 Cooper（1989）添加的，第四和第五个是 Baker（2003）建议的。除了这五个层次之外，语言规划还可以包括“话语规划”，它负责处理和管理来自不同来源（如政府、教育机构、媒体等）的权威话语在产生和传播关于语言的信仰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意识形态工作。（Lo Bianco 2004）。

我们认为，宏观（国家或全球层面）、中观（区域或组织层面）和微观（个人或社群层面）的语言政策干预遵循了一种可以称之为“等级政治”（即如何在不同层次上组织和理解政治现象）的模式（Summerson 和 Lempert 2016），从这个角度来看，分析语言政策时要关注两个政治维度：一个是将语言政策与制度、官方和法律行动联系起来的维度（宏观和中观层面的干预）；另一个是关注语言政策如何受到本地信仰、实践、意识形态和动机等因素的影响（微观层面的干预，这些因素可能影响他们选择使用哪种语言）。例如，Spolsky（2004）提出将地方语言政策和实践之间建立联系，重点关注语言管理、语言意识形态和语言实践。在这种观点下，语言政策（语言的决策和原则）和语言规划（具体实施和实践）之间的区别不那么明显。这种地方视角可以揭示语言政策研究中过度关注宏观层面和自上而下方法的问题：“尽管语言规划的研究主要关注宏观层面，但理解语言政策和规划在微观层面是如何运作也非常重要”（Kaplan 和 Baldauf 1997:1）。

这种等级政治也有助于塑造非洲、拉丁美洲和阿拉伯世界的语言认知（即人们认为什么是语言）。此外，在这些地区，教育政策的制定受到了一种将语言分为不同等级的观念和一种基于这种观念的语言权利制度（the regime of language rights）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语言政策和规划不仅仅是关于语言本身，而且与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背景紧密相连，是一个意识形态政治框架。

根据 Bonacina-Pugh (2012：216) 的观点，“语言政策和规划是意识形态过程，与多数和少数语言群体之间的权力关系和不平等问题紧密相关。”我们认为，通过采用预先组织的模型和方法应用于本地语言环境，可能无意中复制那些在全球范围内导致不平等的做法，重现了以欧美国家为中心的、主导全球语言政策和实践的观点（这种观点可能强调欧洲和北美的主要语言，如英语、法语、德语等，在国际交流和合作中的重要性，并在全球范围内推广这些语言的使用），这可能导致某些个人或群体因为使用这些主导语言而获得优势，同时使其他非西方国家和地区的语言和文化相对边缘化。

我们还了解到，对语言权利制度的分析必须考虑当代资本主义和技术背景，因为资本主义和全球化过程可能将语言和文化多样性商业化。Dor (2004：102) 指出，“在商业社区中，语言和文化相对主义是一种受欢迎的商品。研究语言和文化的差异，并出售研究结果，是一个繁荣的行业。”这意味着，在全球市场中，研究和销售与语言和文化多样性相关的产品和

服务具有商业价值。

约翰逊和里森托（2013）在关于语言政策和规划领域的文献修订中，提出了以下时间顺序：(a)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的早期语言规划学术研究侧重于统一政治的问题（通过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多种语言或方言整合成单一的、统一的语言来促进国家或地区的团结。这样的政策旨在促进共同的国家认同、文化认同和沟通，但也可能导致对某些语言或文化群体的排斥或忽视），语言被视为一种资源并受到技术规划的制约（在语言政策和规划领域，技术规划包括制定语言标准、推广特定的语言教育策略、创建和维护词典和语法规则等。这些任务通常需要专业知识和技能，并侧重于实现语言的标准化、规范化和有效利用）；(b) 20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研究者开始批评早期作品中实证主义的研究倾向，指出了其局限性；(c) 开始关注批判性语言政策（批判性语言政策关注语言政策和规划背后的权力关系、政治背景和意识形态因素。这种方法认为，语言政策和规划不仅仅是技术性的问题，而是与政治、经济和社会背景密切相关的现象。因此，在研究语言政策和规划时，批判性语言政策试图揭示这些现象背后的政治机制，分析它们如何影响语言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以及如何塑造社会中的权力关系和不平等现象）；以及 (d) 21 世纪语言政策民族志的出现（一种研究方法，关注语言政策在实际社会背景中的应用和实施。民族志方法通常涉及对特定社群或文化的深入研究，以了解人们是如何在现实生活中使用和理解语言政策的），将结构-能动（这个观点关注结构（如社会制度、文化传统等）与能动性（个人或群体在特定情境中的选择和行动）之间的互动。在语言政策民族志研究中，这意味着研究者需要关注制度和个人行为之间的关系，以了解语言政策是如何在特定背景下发挥作用的）、微观-宏观（这个观点强调在不同层次上分析问题的重要性。在语言政策民族志研究中，这意味着研究者需要关注从个人、社群到国家和全球层面的语言政策现象）和政策-实践视角（这个观点关注政策与实际操作之间的联系。在语言政策民族志研究中，这意味着研究者需要了解政策是如何在实际生活中被执行和应用的，以及实践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和挑战）相结合。

这个时间顺序主要是在北美和欧洲的语境下，无法充分反映殖民和后殖民背景下的语言政策和规划问题。霍恩伯格（2006）将各种语言规划目标、类型和方法整合在一个概念框架中。

我们认为，需要以批判性和历史性的视角来理解以下两点：（a）欧洲-北美观点对非欧洲或非北美语境中语言形态的影响；（b）非欧洲-非北美地区的本地概念和“语言经验”。这意味着，即使是看似中立和客观的民族志研究方法，但在研究殖民和后殖民语境中的语言政策和规划时，可能会无意中传播和巩固一些历史上的殖民观念。这是因为这些研究方法可能受到其发源地的历史、文化和社会背景的影响，从而在研究其他文化和社会现象时，可能会产生一定的局限性和偏见。我们认为，历史有助于我们理解殖民记忆如何在当代语言政策和规划中得到再现和更新的，所以，在分析语言政策和规划时，需要关注其历史背景和殖民过去对其形成的影响。。

最后，我们认为语言政策与特定的身份政治密切相关（身份政治是指人们根据他们的种族、性别、性取向、宗教信仰等特征来组织和推动政治议程），这意味着关于语言的话语也涉及到其他方面的特定的表述框架。例如，关于移民或难民的语言问题也是与国家或国家化背景下的公民身份相关的身份问题。在这些背景下，语言选择和语言使用是一种“被授权”的人权（Whiteley 2003）。濒危语言的话语战略性地将语言描述为自然物种（如“语言死亡”），从而为语言权利的主流话语提供基础。有机主义的语言观念(意识形态)（一种将语言视为与特定社会和文化环境紧密相连的观点）将语言看作是构建社会空间和形成特定主体性的方式。简单来说，有机主义的语言观念认为，语言是塑造我们的社会关系和个体认同的重要因素（例如，Errington 的濒危语言论述）。批判性的符号学民族志视角主张将语言权利纳入语言相对论的概念框架内（语言相对论是一种关于语言和思维之间关系的理论观点。语言相对论认

为，我们所使用的语言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们的思维方式和对世界的理解），【进而探讨不同社会语言环境是如何影响个体的思维方式和对世界的看法，以及如何影响语言权利的认识，】重点关注当地社会语言市场是如何组织语言资源的（Bourdieu 1991）。

同化和融合的观念，以及方言、语言变体和语言本身，也可以从政治、历史、话语、多元跨语言和多重符号语言的角度来看待。这些维度之间的相互关系可能导致这些概念产生不同的含义和解读，从而使它们变得更具问题性。

另一个现象，是语言规划所关注的，是社会空间的符号表述。'语言景观'这个概念诞生于语言规划领域，特别是在比利时和魁北克的语境中，强调语言在通过公共标志上的语言使用规定组织公共空间方面的作用（兰德里和布尔希斯，1997）。然而，在传统的语言规划实践中，语言景观这一概念缺乏理论支撑和相关研究支撑，主要关注的是与本体规划和地位规划有关的问题。兰迪和布尔希斯（1997:25）给出如下概念表述，这成为了'语言景观'的默认定义：公共道路标志、广告牌、街道名称、地名、商店招牌以及政府建筑物上的公共标志的语言，共同构成了一个特定领土、地区或城市群的语言景观。

尽管 Landry 和 Bourhis（1997）的开创性研究采用了统计方法来研究语言景观作为多语言环境中民族语言活力的变量，但现在该领域在方法论和认识论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发展，采用了包括符号学、民族志和话语分析在内的不同跨学科视角和方法（Blommaert 2013; Shohamy 和 Gorter 2009）。目前，该领域的研究与文化和社会理论紧密结合，探讨历史和社会力量如何通过语言景观表现出来，并逐渐成为该地区或社会特有的语言特征。这种民族志历史重点使得“语言”的抽象和独立的“语言”概念受到质疑，转而将关注点扩大到了包括所有符号的传播方式以及它们与其他社会、政治和经济因素的联系（参见 Mokwena，第八章）。

2. 殖民地语言话语：欧洲中心主义的单一语言观

殖民地语言话语及其在非西方语境中的实践（包括非洲、阿拉伯中东和拉丁美洲）对特定的社会交际现实的构建作出了积极贡献。殖民地语言政策是殖民地统治策略的一部分，其中包括殖民者在社会上创造一种人为的归属结构，以及将不同地区的语言/方言赋予等级不同的价值（殖民者在对待不同地区的语言/方言时，一方面根据他们在当地社会的地位和重要性，给予不同层次的价值；另一方面，这些语言/方言在西方传播媒介中，往往被认为是次要的、地位较低的）。

殖民地统治者通过这种社会意识形态重构，创造了各种族群的身份认同和归属感，同时强调了它们之间的差异，从而加强了殖民者对当地社会的控制。尽管殖民地语言话语并非严格统一或单一（如法国模式与英国模式），但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后殖民时期的正式政治和教派关系【正式政治逐渐分化为不同的教派，并受到教派利益的影响；原本可能只是宗教或文化的教派关系变得越来越政治化，教派间的矛盾和冲突可能因政治目的而加剧。】几乎所有非洲国家和阿拉伯世界（如黎巴嫩、伊拉克）目前的社会政治状况都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殖民地语言话语及其在非洲、阿拉伯中东和拉丁美洲等非西方语境中的实践，以及殖民地语言政策和殖民地统治策略，都对这些国家的特定社会交际现实产生了影响。这种影响使得这些国家的社会政治状况与其更广泛的历史背景紧密相关。】因此，要了解这些国家的（跨地域）本地关系为何呈现现在的状况，就需要从更广泛的历史角度来审视这些殖民地语言话语及其在非西方语境中的实践。

这些殖民时期和后殖民时期的语言项目与国家建设过程紧密相连。这些项目基于一种特殊的工具性语言观念，即将语言视为“沟通手段”，认为语言是中立的（因此无政治色彩）、单一的（因此不变）、固定的（因此不受语境使用影响）以及严格遵循规则的（而非部分混

乱）。这种语言观念认为语言是在社会互动之前就存在的，因此被视为自然存在，而不是在互动中产生的。我们 认为塑造、分类和标记语言的殖民意识形态形态仍在影响现代的语言实践和规划，使得某些地方的语言实践被视为非语言或者劣等、退化的语言。

值得注意的是，在阿尔及利亚等语境中，语言意识形态冲突总是质疑前殖民语言（如法语）的制度化地位（参见本拉巴赫第二章）。即使有些国家（如苏丹）已经摒弃了正式的殖民地语言政策，但它们仍然生活在话语殖民性的环境中【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话语上，即人们在交流、思考和表达观念时所使用的语言和表达方式。话语殖民性意味着这些国家的思维和表达方式仍然受到前殖民者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可能会制约他们的发展和独立性】。而研究殖民地语言观点的确切目标是追踪这些国家日常生活中的殖民地性条件【这种殖民地性可能表现为对前殖民地语言的依赖、对殖民地价值观和文化的接受，以及社会制度和政治结构中殖民地时期的遗留影响】。在接下来的内容中，我们将确定这种殖民地语言叙述的主要特征。

首先，殖民地语言叙事通过对历史互动类别（如“本土语言”）的自然化，美化了社会关系【“历史互动类别”指的是在历史上形成并影响社会互动的各种类别，例如在这里所提到的“本土语言”。“历史互动类别的自然化”是指将这些历史互动类别视为自然而然的现象，而非人为创造的。这种自然化过程使得这些历史类别在社会关系中被接受并视为正常。在这个例子中，通过自然化“本土语言”这一历史互动类别，殖民地语言叙事将这些语言看作是固有的、天然存在的，而非殖民地政治和文化影响下产生的。这种自然化有助于巩固殖民地统治者的权威，同时将这些本土语言视为不同文化和族群之间互动的基础】。这种建构反映了早期现代社会的“纯粹性”，目的是为了满足特定的宗教和实际需要。例如，在某些非洲语境中，语言的本土性概念被用作构建“部落”关系的一个话语资源【这里的“话语资源”是指通过某种论述手法，以语言为工具来实现特定目的的资源】。在这种情况下，殖民地基督教传教士运用了语言本土性的概念，通过想象和强调部落间关系的差异，来人为地创造部落关系【这样做的目的可能是为了巩固殖民地统治，因为部落间关系的划分和创造有助于阻止不同部落团结起来反抗殖民统治】。因此，在特定地理区域的群体中，本土语言得到了正式的认可和记录（Agha 2007）【这个过程是通过制度化手段完成的，例如在官方文件或政策中对本土语言进行确认和支持】。这种符号化的“登记”过程【语言文字的制度化过程】塑造了一种特殊的对“本地”概念认识，而这种认识通过词典、入门读物和教科书等文本艺术品的制作得以“标准化”。

虽然文本工具（如教材、课本等）被认为是教育过程中的客观工具，但通过使用这些文本工具进行知识建构的过程，加强了当地人和传教士组织之间的不平等权力关系。如果“本土语言”是【外部势力（如殖民者或传教士组织）】通过语言规划干预而产生的【这指的是外部势力（如殖民者或传教士组织）对本土语言进行规划或改造的过程。在这种情况下，本土语言可能受到了殖民者的影响，以适应他们的需求和价值观】，那这些“本土语言”的基础概念，如“母语”和“母语使用者”，也变成了殖民秩序的组成部分（参见 Makoni、Severo 和 Abdelhay，第九章）【“殖民秩序”是一个更广泛的概念，用于描述殖民地时代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秩序。在这种秩序中，殖民者通过语言、教育和其他手段来控制和塑造殖民地社会。换句话说，这些概念可能已经被改变或重新定义，以适应殖民者的需求和价值观】。换句话说，在这些“本土语言”的语境中，确定“母语”和“母语使用者”的标准已经由一套编码的文本标准来决定，这些标准被认为是“客观”的。在殖民地时期，本土语言与特定的意识形态表达联系在一起，被描述为充满异国情调且纯粹的，与殖民者的语言相对立。现如今，本土语言这个词，尤其是在国际法律语境和土著人民自己的表述中，它的负面印象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积极的内涵。例如，通过使用“多元性”这个词（Maurial 1999），赋予了“本土语言”积极的内涵（Maurial 1999）。我们认为，在一个充满历史变迁和政治、

物质资源冲突的环境中，例如苏丹，“本土语言”这个术语可以被战略性地运用在官方政策文件中，用以标识“他者”，比如说阿拉伯语人群。可重点是这些殖民地语言规划活动本质上是“表演性的”【“表演性的”强调了殖民地语言规划活动通过实际行动改变和塑造特定社会现实的能力】，殖民者通过制定政策、推广特定语言等手段，有意识地在殖民地区建立民族语言差异【这些差异往往体现在语言使用、教育制度等方面，从而强化了族群之间的划分】，同时使得民族语言差异在特定地区变得自然化【这是指通过殖民地语言规划活动的实施，使得这些人为构建的民族语言差异变得看似“自然”和“不可避免”。这个过程使得人们开始认为这些差异是固有的、不可更改的，从而加深了族群之间的隔阂】。

殖民地政府、传教士和专业语言学家在处理社会多样性问题时，一个重要的策略就是举办各类“会议”。 在殖民地会议期间，如 1928 年苏丹的 Rejaf 语言会议，种族语言界限被构建、编码、强加和自然化。这种殖民地时期的多元文化和多语言主义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全球殖民地区后殖民时期的政治实践特点。

殖民地语言话语的另一个特征在于它们包含了单一语言意识形态，即将单一语言主义视为评估动态语言实践的标准。欧洲中心的单一语言论将语言看作一个可以用数字统计、稳定的、抽象的整体概念。这种单一语言论的概念体系，在调控和组织人们接触正式知识生产机构（如学校、研究机构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这样的体系排除了其他语言和方言的使用，限制了不同语言背景的人们接触正式知识机构的机会，从而巩固了殖民者的地位和影响力】

简而言之，概念是概念是在特定的结构和理论中形成和发展的。西方的语言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些特定的概念，这些概念都带有一定的理论和意识形态内涵。在西方语言理论中常用且带有特定理论和意识形态内涵的词汇包括“语言”、“母语”、“母语者”、“语言权利”、“第一语言”和“双语主义”。本文集中的大部分文章都在使用或批判这些词汇，因为它们代表了西方语言和社会的特定观念。

3. 阿拉伯语与语言的象征功能

阿拉伯世界的社会语言现象是由多方面因素共同影响的，包括公共政策、政治意识形态和语言政策等。在阿拉伯世界，通常将社会交际秩序视为“双重语言现象”（Ferguson，1959，1991），即阿拉伯语存在不同的层次和功能，包括高级变体（标准阿拉伯语或 Fus-ha）和低级变体（方言或口语）。这种“双重语言现象”反映了不同语言群体在社会结构中的权力和地位（Bourhis、Montaruli 和 Amiot 2007）。

我们并不打算详细回顾与阿拉伯语有关的双重语言现象概念，因为这方面的研究已经很多。相反，研究阿拉伯世界的语言政策和规划应该始从更宏观的社会政治整体角度出发。为此，我们可以利用双重语言现象作为一个切入点来探讨阿拉伯地区的政治和文化历史。事实上，双重语言现象揭示了阿拉伯世界话语关系的组织方式，这种现象之所以显著，是因为它深入人心并与民间的语言意识形态密切相关（Suleiman 2014）。

语言使用包含两个主要维度：工具性和象征性（Suleiman 2003）。在实际语言使用中，这两个功能可能同时存在，但通常有一个占据主导地位。在特定情境下，工具性维度可能被有意地强化，以实现某种象征性目的（Silverstein2003；Suleiman 2013，2014）。关于双重语言现象的研究往往忽略了其象征性维度，而这个维度与冲突、历史和身份问题密切相关。在制定语言规划和政策时，应充分考虑工具性和象征性之间的区别，以探索政策和表达意识形态（Bassiouney 2009）。本文集中的三篇文章在研究背景中都考虑了工具性和象征性之间的区别。

在阿拉伯世界中，政治体制是根据文化传统构建的，比如说乌玛（宗教联系金木的穆斯

林社群），尽管在某些现代语境中，乌玛与西方的“民族”概念有相似之处，但仍被认为是一种“泛民族身份”概念。阿拉伯语中的 watan 一词在西方概念体系中的对应含义是“国家”(Bassiouney 2009)。从历史上看，在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被纳入现代国家体系之前，它已经形成了具有独特特征的现代性形式。这正是语言政策作为一个（泛）国家建设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的文化工具作用。在讨论作为一种制度化的文化选择、排除和编纂过程的语言规划时，要注意到这一过程实际上可以追溯到先知穆罕默德・阿布・巴克尔时期 (573-634)，他将古兰经编纂成一个公认的标准版本。

在伊斯兰教传播到非阿拉伯语区时，早期穆斯林学者在政府支持下对阿拉伯语进行了标准化，以保护“古兰经的语言”不受非阿拉伯语母语者（Ajam）的影响。这里的重点是，在西方殖民主义之前，穆斯林世界已经对语言的语法结构有了一定的了解。因此，这里有一个问题，即如何研究西方现代性对阿拉伯世界语言文化产生的社会语言学影响，以便将双重语言现象与政治联系起来。

简而言之，阿拉伯世界国家的现代结构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西方殖民主义的文化话语等因素塑造的（参见 Benrabah 第二章）。在获得独立后，大多数阿拉伯国家在进行现代化民族建设过程时以西方模式为参照。制定阿拉伯化语言政策和建立语言规划机构，如阿拉伯语言学院和现代教育体系，都是民族建设过程的一部分。在这一民族主义方案中，阿拉伯语（即：标准阿拉伯语）作为官方沟通工具和特定民族归属的象征而受到尊崇（Suleiman 2003）。这里占主导地位的语言意识形态是“一国一语”的单一语言观念。所有与主流观念背道而驰的的声音和力量都受到了严厉的打压或被降低了地位。这种情况在阿拉伯国家中是普遍存在的。

阿拉伯世界意识形态语言政策的特点之一是将“语言”视为单一（例如'阿拉伯语'是埃及的官方语言）。这种单一语言观念导致的结果是减少了“阿拉伯语”以及更重要的“标准阿拉伯语”内部的变化。这种阿拉伯化观念在“语言意识形态辩论”中也有所体现(Blommaert 1999)，其中“阿拉伯语”（标准阿拉伯语）被形象地描述为“濒危语言”。这种关于濒危语言的论述在本质上是具有“纯粹主义”倾向的。阿拉伯语应该从受到口语和外语结构影响中进行净化。这种在社会上形成的语言焦虑加强了口语和标准语之间以及阿拉伯语与欧洲语言之间的层次关系。阿拉伯语言规划的制度化机制，如词典的编制（无论是一般性的、专业性的还是历史性的）对阿拉伯语在特定社会语言秩序中的使用施加了约束。这种约束导致了在阿拉伯语的不同语言变体（如标准阿拉伯语和地方口语）中，词汇、语法和表达方式的使用和掌握程度存在差异，那些能够熟练掌握和使用这些语言变体的人通常会在社会中拥有更多的权力和影响力。相反，那些只能使用地方口语或无法熟练掌握标准阿拉伯语的人可能会在社会中处于相对劣势的地位。

标准阿拉伯语并不一定总是被认为是具有声望的语言，反之亦然：在一些情况下，非标准语言变体（如开罗阿拉伯方言）也可能被认为具有一定的地位(Haeri2003)。然而，尽管非标准阿拉伯方言可能被认为具有一定的声望，但在意识形态层面上，阿拉伯标准语言仍被认为更为重要，主要原因是它与古兰经的关系。（见 Almahmoud 和 Ahmed，第四章）。阿拉伯单一语言意识形态在多语言实践中塑造了说话者对自己的语言资源（即说话者在使用阿拉伯语及其各种方言时所展示的技能和知识）与阿拉伯语之间关系的看法。（参见 Alkooheji，第五章）。

简而言之，阿拉伯双语现象主要涉及到阿拉伯语言变体在社会层面上的组织和使用，它与政治意识形态密切相关，因此与权力结构和不平等问题有关。民族主义者利用“一个语言，一个民族”的观念，将单一阿拉伯语作为实现民族团结和认同的手段。在正式政治中使用阿拉伯化作为策略，导致了反对语言霸权的观念产生。在成功的情况下，反对霸权的语言意识形态会被纳入官方的多语种政策，摩洛哥和苏丹就是这样的例子（参见 Benton-Monahan 和 Severo，第三章；Makoni 等人，第九章）。

4. 本书的结构

在这本书中，我们将语言理解为一种社会构建的【在社会背景下发展的】、动态的、因而多样的、位于特定背景下的资源体系（例如各种类型的语言风格、方言和体裁）。换句话说，语言不仅仅是交流工具，也是一种历史和政治现象，因为它表达并反映了人们在充满权力关系和社会斗争的环境中的真实社会政治关注点。这意味着任何语言的发展轨迹，从定义上讲，都是一种意识形态现象，是更广泛的社会动态和构成生存条件的过程的一个方面【这句话强调了语言发展与社会动态、意识形态和生存条件之间的关联】。要了解语言与社会经济现象（例如种族主义，殖民主义的影响）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应该对语言使用进行全面调查，将语言产品（如政策声明）重新置于人种学和历史背景下进行研究。本书中的每个章节都试图通过各自的方法来揭示和探讨这些复杂的关系。以下概述了组成本书的九章。

本书提供了关于非洲和中东不同背景下的语言规划和政策的独特跨文化视角，包括南非、巴林、苏丹、沙特阿拉伯、摩洛哥、赞比亚和阿尔及利亚。此外，还考虑了南美洲（如巴西）的移民情况。通过将非洲和中东的不同背景汇集在一起，本书试图促进这些地区语言政策研究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本书的主要目标是研究官方语言政策的社会、政治和教育功能以及其对不同身份认同（宗教、民族和宗派身份）的影响。本书的第二个目标是分析针对多语言主义的普通和专业观点，以及它们如何影响和受到语言政策的影响。

本书的第三个目标是运用多种理论视角（语言景观、殖民地语言学、殖民历史、语言意识形态、语言态度和系统功能语言学）分析语言政策文本，这、有助于、形成对语言问题的全面认识。第四个目标是通过强调一些实例（非洲和中东背景下的语言使用、语言意识形态和语言政策），来揭示殖民意识形态在当代观念中的影响。本书最后探讨了殖民地和后殖民地背景下的学术研究对整个语言学术领域的贡献。

穆罕默德 • 本拉巴赫（Mohamed Benrabah）的章节《解构“旧世界”：殖民地和后殖民地阿尔及利亚的语言政治》从批判的角度探讨了阿尔及利亚[1]殖民和去殖民过程中的语言文化过度现象。本拉巴赫认为，欧洲人引入的殖民做法在前殖民地国家仍然延续，而语言去殖民化进程尚未完成，原因就在于殖民地语言意识形态的顽固性。作者讨论了两个方面：（一）殖民者实施的法国化政策，旨在去阿拉伯化和去柏柏尔化殖民地人民；（二）独立后当地领导人实施的去法国化政策，使得关于民族认同的讨论不得不涉及伊斯兰教和阿拉伯语。本拉巴赫称，这两种政治做法都充满了殖民意识形态，如种族化、单一语言和语言等级观念。对于作者来说，去殖民化项目未能为阿尔及利亚人带来语言和平，因为语言分裂仍然体现着殖民意识形态。

【本拉巴赫在这一章节中探讨了阿尔及利亚在殖民和去殖民过程中的语言文化问题，并从批判的角度分析了欧洲殖民者实施的法国化政策和独立后当地领导人实施的去法国化政策。他认为，这两种政治做法都包含了殖民意识形态，导致了阿尔及利亚人的语言和平尚未实现。】

切尔西 •本顿-莫纳汉（Chelsea Benton-Monahan）和克里斯廷 •戈尔斯基 •塞韦罗（Cristine Gorski Severo）在《摩洛哥阿马齐格语政策与矛盾的力量》一文中，根据学术研究和当地个人经验之间的关系描述了阿马齐格语政策。在摩洛哥[2]，阿马齐格语与阿拉伯语和法语争夺

---

[1] 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简称“阿尔及利亚”（阿拉伯语：الجزائر al-Jazā’ir，法语：Algérie），是非洲北部马格里布的一个国家。北部濒临地中海，东邻利比亚、突尼斯，东南和南部分别与尼日尔、马里和毛里塔尼亚接壤，西部和摩洛哥相连，阿尔及利亚的国土面积居非洲各国、地中海各国和阿拉伯国家之冠，排全球第 10 位，人口 4535 万（2021 年），大多数是阿拉伯人，其次是柏柏尔人（约占总人口 20%），国土面积 238 万平方公里，首都阿尔及尔，全国共分为 58 个省。

[2] 摩洛哥王国（阿拉伯语：المملكة المغربية，The Kingdom of Morocco，Le Royaume du Maroc），简称摩洛哥，

更高地位和官方认可已有近七十年的历史。阿马齐格语使用者包括被称为摩洛哥土著人口和临近国家（如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利比亚和毛里塔尼亚）的人民，他们与这片土地有着深厚的文化联系。作者呈现了阿马齐格语获得认可的过程（2000 年开始在学校教授阿马齐格语，在 2011 年成为官方语言），这与摩洛哥一位阿马齐格语教师的观点形成鲜明对比，其个人经历揭示了语言政策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力量之间紧张关系的产物。

【本章分析了摩洛哥阿马齐格语政策及其与学术研究和个人经历的关系。在摩洛哥，阿马齐格语长期以来一直在争取地位和认可，作者通过介绍阿马齐格语的发展过程，以及一位摩洛哥阿马齐格语教师的观点和经历，揭示了语言政策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力量之间紧张关系的产物。】

马哈茂德·阿尔马哈茂德（Mahmoud A. Almahmoud）和马哈古布·达法拉·艾哈迈德（Mahgoub Dafalla Ahmed）是《通过调查学生对 SA、CA 和英语态度的沙特语言规划》一章的作者。他们调查了沙特[3]大学生对使用两种阿拉伯语变体（标准阿拉伯语，SA）和口语阿拉伯语，CA））以及英语的态度。沙特阿拉伯独特的社会语言现实背后的原因是该国有大量非阿拉伯外国人。例如，一个人可能用 SA 写一封官方信函，用 CA 与朋友交谈，用混杂语言与外国工人交流，用英语在餐厅点餐。研究结果表明，学生在日常生活中主要使用 CA，很少使用 SA 或英语，而 SA 在媒体中的应用比在社交互动或教育中更广泛。此外，与两种阿拉伯语言变体相比，所有学生对使用英语的态度更为积极。学生对 SA 的积极态度背后可能的原因，即受到宗教、语言和文化因素的影响。

【本章研究了沙特大学生对使用标准阿拉伯语（SA）、口语阿拉伯语（CA）和英语的态度。沙特阿拉伯的人口状况使得该国形成了独特的社会语言现实。调查结果表明，学生在日常生活中主要使用 CA，而 SA 在媒体中的应用更广泛。此外，学生对使用英语的态度比使用阿拉伯语变体更积极。对 SA 的积极态度可能与宗教、语言和文化因素有关。】

本章名为《巴林国立学校巴基斯坦和俾路支少数民族身份认知与（隐含）语言政策关联》，作者为拉米娅·阿尔库赫吉（Lamya Alkooheji）。研究基于在巴林[4]国立学校的乌尔都语和俾路支移民学生的观察，探讨了学生在接触学校实施的语言政策后如何看待自己的母语和阿拉伯语【研究内容】。巴林是中东阿拉伯湾的一个小国，人口密集，超过 100 万人居住在 770 平方公里的面积内【巴林的地理位置和人口状况】。这个国家的官方语言是阿拉伯语。本章探讨了隐含的语言政策如何影响参与者的语言选择以及他们对每种语言的态度【研究目标】。巴林政府允许所有居民免费享受国立学校的教育。这一教育政策使得国立学校内形成了多语言社区，而阿拉伯语是主要的教学媒介语。研究结果证实了隐含的教育语言政策对那些有民族背景的人产生的积极影响，没有侵犯他们的语言权益或给他们带来困扰。

【本章通过观察巴林国立学校的乌尔都语和俾路支移民学生，研究了他们在接触学校实施的语言政策后如何看待自己的母语和阿拉伯语。巴林是一个阿拉伯语为官方语言的国家。研究

是非洲西北部的一个沿海阿拉伯国家，东部以及东南部与阿尔及利亚接壤，南部紧邻西撒哈拉，西部濒临大西洋，北部和西班牙、葡萄牙隔海相望，首都拉巴特，国土面积 45.9 万平方公里（不包括西撒哈拉 26.6 万平方公里），全国划分为 12 个大区（包括西撒哈拉），人口 3621 万人（2021 年），阿拉伯人约占 80%，柏柏尔人约占 20%。

[3] 沙特阿拉伯王国（阿拉伯语：المملكة العربية السعودية），通称沙特阿拉伯（台译沙乌地阿拉伯），简称沙特。沙特实行自由经济政策，位于亚洲西南部的阿拉伯半岛，东濒波斯湾，西临红海，同约旦、伊拉克、科威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阿曼、也门、巴林、卡塔尔等国接壤，首都利雅得，国土面积 225 万平方公里，人口 3617 万（截至 2022 年 9 月），其中沙特公民约占 62%，全国分为 13 个省。

[4] 巴林王国（The Kingdom of Bahrain），简称巴林（Bahrain），位于波斯湾西南部的岛国，介于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之间，与沙特有跨海大桥相连接。属热带沙漠气候，夏季炎热、潮湿，7 至 9 月平均气温为 36℃。冬季温凉时有降雨，12 月至次年 2 月平均气温 10℃-20℃。其他时间（3 至 5 月、10 至 11 月）气温在 20℃-30℃。年平均降水量 71 毫米，国土面积 779.95 平方千米。巴林全国分为 4 个省，分别是首都省、穆哈拉克省、北方省、南方省，首都为麦纳麦。截至 2022 年 6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官网显示，巴林王国人口 150 万，外籍人占 55%。

发现，隐含的教育语言政策对有民族背景的人产生了积极影响，而不会压制语言权利或给他们带来不适。】

费利克斯·班达（Felix Banda）和大卫·桑尼·姆万扎（David Sani Mwanza）的这一章，《“这个想法是，接受过培训的人需要教导其他人”：关于 2014 年赞比亚[5]初级识字政策变化的批判性思考》，关注了 2014 年赞比亚教育政策中有关教学语言的转变。这项政策规定，从幼儿园到四年级的教学语言应该是赞比亚官方划分的七种语言之一。作者基于教师培训学院讲师、赞比亚语言中小学教师以及赞比亚语言专家的观察和访谈数据对政策的转变进行了评估【作者评估政策转变的方法】。班达和姆万扎还追溯了围绕北罗得西亚（现赞比亚）语言教育政策的矛盾和争议的历史，这些政策通过传教士、英属南非公司、英国殖民地办公室以及新兴的独立非洲政府管理机构得以实施【作者对赞比亚语言教育政策历史背景的探讨】。他们的研究结果显示，新政策与过去因应用僵化以及坚持使用赞比亚语言的标准版本（而教师和学习者很少使用这些版本）而失败的政策并无不同。

【班达和姆万扎关注 2014 年赞比亚教育政策中的特定语言变化，该政策规定从幼儿园到四年级的教学语言应是赞比亚官方划分的七种语言之一。通过对教师培训学院讲师、赞比亚语中小学教师以及赞比亚语言专家的观察和访谈数据，作者评估了政策的转变。研究发现，新政策与过去因应用僵化以及坚持使用赞比亚语言的标准版本而失败的政策并无不同。】

在题为《1996 年南非宪法第 108 条法案中权利法案第 29 条的系统功能语法分析，参考后种族隔离时期维持种族化身份制度：对民族建设的影响》的章节中，易卜拉欣·亚历山大（Ebrahim Alexander）和莱昂·普雷托里斯（Leon Pretorius）认为，在后种族隔离时期维持种族分类制度与南非公民的有意义变革相悖。作者主张公共政策评估应同时关注语言政策的实施以及文本层面的解释（人们将公共政策视为一种话语进行解释和理解）。在结论中，作者强调南非在后种族隔离时期维持种族化身份制度，这在文件序言中的“多样性”概念中得到体现。

洛拉托·莫克韦纳（Lorato Mokwena）的章节《只要我理解顾客，我就会回答他们: 跨语言小卖部与多元单一语言的南非宪法》讨论了一位小卖部老板的跨语言实践与南非[6]宪法对语言的处理之间的对比【本章的主题】。尽管南非政府继承并制度化了殖民地时期的语言认知观点，但莫克韦纳通过使用语言景观材料和与小卖部老板及顾客的访谈数据，展示了小卖部作为跨语言空间的存在。本章认为，尽管宪法将南非描绘成一个多元的单一语言的社会，但南非实际上是一个多元的跨语言社会，如小卖部的语言/符号景观。

辛弗里·马科尼（Sinfree Makoni）、克里斯廷·塞韦罗（Cristine Severo）和阿什拉夫·阿卜杜勒海（Ashraf Abdelhay）是《殖民语言学与语言的发明》一章的作者，旨在通过关注苏丹[7]殖民语言学在当地背景中的作用，参与关于语言政策和实践历史演变的讨论。作者们认

---

[5] 赞比亚共和国（The Republic of Zambia）是非洲中南部的一个内陆国家，简称赞比亚，大部分属于高原地区。北靠刚果民主共和国，东北邻坦桑尼亚，东面和马拉维接壤，东南和莫桑比克相连，南接津巴布韦、博茨瓦纳和纳米比亚，西面与安哥拉相邻，国土面积 752614 平方公里，人口 1890 万（2021 年），大多属班图语系黑人，有 73 个民族，奔巴族为最大部族，约占全国人口的 33.6%，首都卢萨卡，全国下设 10 省 103 区。

[6] 南非共和国（英语：The Republic of South Africa），简称“南非”。地处南半球，有“彩虹之国”之美誉，位于非洲大陆的最南端，陆地面积为 1219090 平方公里，其东、南、西三面被印度洋和大西洋环抱，陆地上与纳米比亚、博茨瓦纳、莱索托、津巴布韦、莫桑比克和斯威士兰接壤。东面隔印度洋和澳大利亚相望，西面隔大西洋和巴西、阿根廷相望。南非拥有三个首都：行政首都（中央政府所在地）为比勒陀利亚， 立法首都（议会所在地）为开普敦，司法首都（最高法院所在地）为布隆方丹，国土面积 1219090 平方公里，人口 5962 万（2020 年）。分黑人、有色人、白人和亚裔四大种族，全国共划为 9 个省。

[7] 苏丹共和国（阿拉伯语：جمهورية السودان；英语：Republic of the Sudan），简称苏丹（Sudan），位于非洲东北部、红海沿岸、撒哈拉沙漠东端。国土面积 1882000 平方千米，为非洲面积第 3 大国，世界面积第 15 大国。首都喀土穆，全国共设 18 个州，人口约 4668 万（2022 年），主要人种包括阿拉伯人、贝贾人、富尔人、努巴人及黑人等，其中阿拉伯人占 70%。]和巴西[巴西联邦共和国（葡萄牙语：República Federativa

为殖民语言学是一种现代方法，可以重新审视语言在殖民过程中的政治作用，其中就包括了语言政策在传统意义上需要解决殖民与语言之间关系的基本观点。作者们质疑了一些广泛使用的词汇和类别，如“殖民政策”、“殖民扩张”、“后殖民土著语言”、“殖民语言”、“殖民地区”、“殖民势力”和“殖民世界”等，这些词汇和类别可能无法准确描述各种不同的当地背景。

【作者们通过关注殖民语言学在苏丹和巴西的作用，参与了关于语言政策和实践历史演变的讨论。他们对一些广泛使用的词汇和类别提出质疑，认为这些词汇和类别可能无法准确描述各种不同的当地背景。作者们认为殖民语言学是一种现代方法，可以重新审视语言在殖民过程中的政治作用。】

在《后殖民语言教育还是隐蔽的语言殖民性？》一章中，Finex Ndhlovu 试图通过揭示语言政策制定、政治利益以及在多元化的社会背景下政府或权力机构所试图寻求的一种共同的语言和文化标准（即语言和文化统一性），这些因素之间错综复杂的联系，为后殖民非洲语言政策的讨论提供新的理论观点。作者认为，尽管语言政策通常是出于良好的初衷而制定的，但它们也有一个阴暗面，常常导致意想不到的后果，如在社会、经济和政治上排斥或边缘化少数民族和沉默语言（指那些在国家或地区中没有得到足够关注和支持的语言，通常是因为它们的使用者人数相对较少或者在社会中的地位较低）的使用者。作者认为，主流的语言教育模式——多语言教育、母语教育、加法双语教育（一种双语教育模式，强调在学习第二语言的同时保持和发展第一语言）——在后种族隔离时期的南非广受欢迎，这表现出了“语言殖民性”的微妙之处，它使得语言与权力之间的关系变得复杂。这引出了一个问题：除了殖民者视角的语言观，还有没有其他关于语言的哲学或观点？如果没有，那为什么我们不能发展一些呢？为什么来自殖民地的学者、政府和社会政策专家总是选择采用来自殖民者的语言意识形态和理论框架呢？【作者试图提出一个新的视角，关注后殖民非洲语言政策与政治利益之间的关系。作者认为，尽管语言政策的制定往往出于善意，但它们可能带来负面影响，如导致少数民族和沉默语言使用者在社会、经济和政治方面受到排斥或边缘化。此外，作者还指出，主流的语言教育模式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语言殖民性”，这使得语言与权力之间的关系变得复杂。于是作者开始质疑为什么殖民地、政府和社会政策专家总是选择采用来自殖民者的语言意识形态和理论框架。】

---

do Brasil；英语：The Federative Republic of Brazil），简称巴西(Brazil)，与乌拉圭、阿根廷、巴拉圭、玻利维亚、秘鲁、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圭亚那、苏里南、法属圭亚那十国接壤，国土总面积 851.49 万平方公里，是南美洲最大的国家，居世界第五，全国共分 26 个州和 1 个联邦区，首都巴西利亚。2022 年 10 月，巴西总人口 2.15 亿。